



阿洛夫在手术中

『模范医生』的阿洛夫被毛泽东赞为

□ 武斌

阿洛夫原名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特列宾，1905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成功后，进入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学习，专攻外科。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医院工作、专科进修和专业实习，成为医科大学外科教授。早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的苏日冲突和苏芬战争中，阿洛夫就参加了战场救护，成为一名出色的野战外科专家。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奥勒尔军区和库尔斯克军区的军医总监，并因在野战医学方面成就卓著，获得苏联政府勋章。

1942年至1949年，阿洛夫先后以外科医生和外科主任身份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和保健，也为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治病。与其他“洋大夫”不同的是，阿洛夫还肩负着中苏两党的联络任务。他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中国人民抗战事业，愿意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阿洛夫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抗日战争时期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缓解了革命根据地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医学思想、治疗技术在我军医疗卫生界的传播，促进了我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和发展。

阿洛夫的高超医术曾在根据地被广为传颂。他的“延期换药法”，纠正了向伤口中填塞纱布条的传统做法，改为采用严密消毒、不填纱布、减少换药次数的新方法；他提倡的“动静疗法”，主张病人术后早拆线、早下床、早活动，以改善全身血液循环，促进伤口快速愈合；他带来的用鞣酸、硝酸银治疗战斗烧伤的技术，以及在野战条件下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一整套方法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他为节省药品，免除病人痛苦，在医疗中还多有创举。比如，他利用香蒲制成药棉，质量很高、吸水性强，又节省了材料；他采用别特曼氏疗法治疗烫伤，做一层假肤敷住伤口，数日后便可痊愈。1942年9月，党中央为阿洛夫批准了具有专门手术台的手术室，毛泽东亲自在手术台上题写“治病救人”四个大字。

在延安，经阿洛夫之手治愈的病人“广至各分区县市”，百里以外的群众络绎不绝地来找这位“洋大夫”看病，为了感谢他，当地群众把他住的枣园后沟改名为“阿洛夫沟”。为了表彰他的出色工作和突出贡献，1944年6月，阿洛夫当选为中央医院模范医务工作者。在全延安的卫生动员大会上，他受到毛泽东亲书“模范医生”的锦旗奖励。同年冬，他又荣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特等奖励，成为出席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英雄。

阿洛夫的医德医风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一切为了病人”是阿洛夫始终坚持的职业操守和工作原则。1944年上半年，阿洛夫工作特别紧张，除了日常的手术外，每天至少要施行一例急症手术。通常是刚完成一例手术，第二例又来了，根本来不及休息。一次，阿洛夫正在施行手术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和睡眠不足而昏倒。人们把他抬回寝室去休息，但一个钟头后，他又出现在手术室里！还有一次，外科收治了一个腹部受伤的病人，医生给他揭开纱布后流出一股咖啡色的脓水，奇臭无比。医护人员受不了，有人捂鼻，有人干脆跑了出去。阿洛夫见状批评道：“哪有嫌病人臭的外科医生呢？都回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嗅觉！”

阿洛夫的管理理念对我军卫生事业影响深远。他注重医疗组织制度建设和医院的科学管理，认为若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分工，治疗便不能有效地进行。因此，他在担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后，着手建章立制，创新科学的工作制度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他把外科系统的手术室、病房和实习医生资源重新整合，分为三个工作单位。每个单位由自己选出的人负责，并明确责任分工，如甲护士负责一切手术器械，乙护士负责一切敷料，卫生员负责抬病人。为了保证组织机构的健全和稳定，提高干部们的责任心，阿洛夫又在外科建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除了每3天一次护士长的集体汇报外，他随时随地抽检工作，找同志个别谈话，了解情况进行教育指导。工作中所需要的每一张表格，他都要要求医生护士无遗漏地填写清楚，即使某一项中没有发生问题，也必须注明“无”而不得出现空白。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外科手术室就像一部流畅运转的机器，即使在全速时也能保证忙而不乱。同时，效率也大为提高：过去数小时才能完成的急症手术准备，当时20分钟内就可完成；过去10个小时才能做7例手术，而当时5个小时可以做完23例。

阿洛夫还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外科专业人才和骨干力量。阿洛夫在中央医院时，按照彭德怀的指示，组建了一个专门对外科医生实施战地救护培训的教学基地。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一人承担了实验、开刀、病房、换药、门诊等多项教学任务，除非有特殊的会诊，他都深入学员中间进行指导。阿洛夫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规定学员学外科前必须有医院多个科室实习经历，其间不可以出任何差错。同时，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战场实际处置能力，加快掌握伤员抢救技术，他注重现场教学，经常把全科医护人员带到野外山地进行模拟训练。阿洛夫带上一套示范一套，经常趴在地上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从火线上将伤员抢救下来而自己不受伤，如何才能爬得快。在他的悉心培育下，有80多位医生顺利毕业并走上外科医疗工作前线。

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国际友人阿洛夫同志》的文章，对他给予高度评价：“阿洛夫同志在和平医院第一部的两年工作中，已给我们的医务界注入了不少新的血液，开辟了医务工作者一个新的方向，无论是在医学、技术或工作作风上，都起着转变和革新的先锋作用。”“无论医疗技术、行政管理和业务教育上，他都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成绩和新的范例。”这既是阿洛夫援华工作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他卓越贡献的中肯评价。



荣氏兄弟的“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 梁林军



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商标

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氏企业主要做吃（面粉）、穿（棉纱）两个产业，一度做到“衣食半个中国”，是民国首富。荣氏亲属分布到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国，涉及领域、行业众多。

荣氏企业由荣宗敬和荣德生缔造，他们是两种类型的企业家。荣宗敬执掌荣氏企业近20年，深得企业家精神的要旨，富于冒险和创新。荣德生性格老成持重，为人谦虚谨慎，以张謇为学习榜样，深得中国传统精神的要义。兄弟俩虽个性和经营理念差异较大，但情深义重，务求和睦，因此荣氏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荣宗敬为主、荣德生为辅的“一核两极”设置：二人长期合作于同一企业，使得荣氏企业有特殊的内生张力。荣宗敬擅长“加油门”，荣德生长于“踩刹车”；荣宗敬立足上海，荣德生扎根无锡；兄弟俩心心相印，相辅相成，存同求异，遥相呼应。

荣德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断，认为“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也”。荣氏这种存不同、容分歧的理念，使得企业内部一直有不同向度的发展；但是当某一方有难时，又以亲情为纽带，施以援手。荣家枝蔓横生，子嗣众多，事业看起来松散，各有一摊，但是一旦遇难时，又能拧成一股绳，互助纾难。荣氏企业发展史上，看起来分歧不小的发展，后来往往证明是为荣氏企业开辟新的、战略性的发展可能。荣德生扎根无锡，在荣宗敬遇到困难时，多次起到扶救的作用；抗战时，荣德生爱婿李国伟执意内迁发展被家族看衰，而荣氏在上海、无锡的产业受到重创时，李国伟在湖北、陕西、四川等地获得大发展。

植根吃穿二门

荣氏兄弟十几岁便在上海钱庄做学徒，创业的起点是广生钱庄，荣氏兄弟又为什么从金融转向实业呢？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



50年代中新厂生产的“蓉华”牌棉纱商标

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兑，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场萧条，只有北运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荣德生曾在广东厘金局做账，发现红（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中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征营业税。

荣德生当差时萌生的创业理想是做“国粉”，即国产面粉。“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兄弟俩在上海当学徒多年，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实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荣氏兄弟都认定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扎根吃穿二门，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纺织厂，将个人的商业发展与国家和民众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荣德生曾和钱穆先生说过，“我们不忍见大量失业壮年沿街乞讨”。因此他们办厂还有救助社会、解决就业的动机。

1916年，荣德生自印《理财刍议》，号召国人多办工厂与世界经济竞争。次年，荣氏兄弟买下日本纱厂“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中国自有纱厂以来，华资企业被外资买下屡见不鲜，反过来外资纱厂被中国人买下的案例少之又少，这场收购是当时华商纺织界的荣耀。抗战期间，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荣宗敬始终不答应。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八厂的股权，荣德生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且写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在民族大义面前，荣家心正，自然头脑清醒。

衣食半个中国

勤劳进取，薄利多销。荣宗敬的经营有四个原则：“建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竟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因为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空间，荣宗敬一直勤勉进取，不断办厂，将不断扩张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

诚信不欺，保质保量。荣氏的“兵船”牌面粉走俏的原因，大多数人以为是茂新面粉厂的美式机器好，其实是因为茂新厂在选麦子时，把潮坏的麦子剔除，没有以次充好。

荣家能够在20年中接连办起21家大型工厂，产量占全国同行近半，源于不断地“滚雪球”：建成一家厂就抵押，取得抵押贷款后再办一家厂，如此循环往复，荣家越做越大。据其族人荣鄂生介绍，荣氏兄弟“对人一片至诚，银钱业相信他们这种诚心，知道他们不是靠欺骗度日的。故从光绪三十四年以后，经历了三四次极大的风波，都能挺过去，还是由于得到银钱业的帮助”。荣宗敬以公司名义参股3家银行，以个人名义参股7家钱庄、2家银行、1家保险，他是上海储蓄银行的大股东，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荣氏企业于一战期间迅速发展壮大。1916年，荣氏兄弟认定可以放手做棉纱和面粉，原因很简单，二者都是战争时期的必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企业提供了出口机会，外国向茂新订购的面粉，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品牌走向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成为中国面粉出口的标准粉。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就规定以“兵船”为标准粉。

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临终时嘱咐荣氏兄弟，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兄弟俩也常教育后人，“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荣德生在钱庄学徒期满后，最想做官，但荣熙泰一再告诫荣德生：“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荣德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謇先生，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造桥修路，兴学育才。他个人生活俭朴，为人谦虚低调，但是对公益事业无比慷慨，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的杰出学生中，有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荣家独资创办的江南大学聘请的专职教授中有钱

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人都对现代新儒家有开山之功。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

在一战期间获得突变式发展、日本几次抢夺都没有击垮的荣氏企业，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反而屡陷险境，困顿重重。荣德生是此时荣氏家族的大家长，体会尤深。国民党的沉重税赋，荣德生斥之为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他对国民党“抽税之狠，不知人困”深恶痛绝，愤然道“苛税横征猛于虎”。除此之外，政府经常性地对荣氏强制摊派军粮、公债；地方军政机关则习惯性地强借强要。民国时期，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恶劣超越了常人的认知范围。

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是脆弱不堪。1927年，因荣宗敬拒绝认购50万元“二五库券”，被蒋介石以“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等借口，查封荣宗敬在无锡的产业，通令军警缉拿荣宗敬。解放前夕，国民党对荣氏财富加紧掠夺，不惜罗织罪名，用政治手段从中牟利。1948年，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又遭遇“私套外汇案”。国民党强推金圆券，要求百姓将手中金银、外汇全部上缴，强取豪夺，无视企业对外汇支付的正常需求。1949年5月，荣毅仁被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涉及罪名很多，包括“侵占公有财物”“盗卖公有财物便利入私”等，甚至诬陷说，军队吃了荣氏的霉烂面粉才在东北打败仗。

但是，荣德生荣宗敬问心无愧，虽被重重围困，仍坚持经营企业。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坚信“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从不为非作恶，既是做人底线，何尝不是企业家的底线和良知！后来我们知道，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把企业无偿捐献给国家，在1978年之后，作为企业家，他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名片”，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这是荣氏作为民营企业的莫大荣耀。从荣毅仁身上，可以看出，荣氏企业“从商绝不为非作恶”精神的家族传承。

以荣氏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历百年数代仍然为国家和社会所赞誉，其精神具有穿透性的力量 and 魅力，究其原因，他们恪守做人的本分和底线，也不忘企业的初心和责任。企业在发展中会不断遇到选择，但是企业家在面临选择时，不能只靠冒险和勇敢，也应该学习先贤的“心正”“无邪”，只有无邪才能真正辟邪。



秦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

□ 郝玉明

机关按照诏书指定科目和要求向中央推荐人才，逐渐形成完备的汉代察举制。

察举主要面向两大群体：一类是没有进入官僚体制的民间优秀人才，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和乡绅等；另一类是有名望、有作为并且廉洁奉公的基层官员，经过推荐并通过察举规定科目的考核后，进入中央行政机关任职。

察举针对不同的中央机关对各类官员的需求，设立了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治剧等种类繁多的科目。其中每年推举的为“常科”，主要有孝廉和茂才两个科目，前者注重德行，后者注重才能，构成了中央行政机关选拔任用官员的主体；根据需要通过皇帝下诏进行临时推举的、不是每年进行选拔推荐的为“特

科”，除了“常科”以外的察举科目均为“特科”。

征辟制也是从汉代开始的、和察举制并行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但并非“常科”，也缺乏明确规矩，要么依据皇帝诏书进行征召，要么由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根据需要自行聘用下属官员。

征召是面向社会有名望的文人名流和有德有才、有名望的较低级别的去职官吏进行选拔的方式。这种由皇帝下诏面向社会范围的公开征召人才，需要辅以大臣察举推荐，既不定期举行，也无一定之规，其向社会传达重视人才、吸纳人才、笼络人才的象征意义更为强烈。

辟除则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长官和地方州郡长官聘任下属官员的一种制度，汉代中央政府辟除包括三

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和九卿辟除，三公辟除选拔聘用官员层次相对较高、升迁进步更快，被称为“入仕捷径”，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州郡辟除尽管由行政长官自行聘任属吏，但还需要经过州郡认可，从而获得正式的官员身份，经州郡辟除官员还可以经州郡长官以察举推荐方式获得晋升，也体现了这一官员选拔制度的优势。

